

# 试论解放区土地改革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变革

秦立海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 天津 300071)

**摘要:** 解放区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变革, 同时也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其对当时解放区农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从而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崭新一页。

**关键词:** 解放区; 土地改革; 农村; 社会变革; 经济; 政治; 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03)05-0037-05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 不仅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完成了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变革; 而且成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带来了农村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 实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但长期以来, 广大学者多集中于对前者的研究, 而较少涉及对后者的探讨,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其实, 土地改革所引起的这场社会变革在当时曾渗透到了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影响之远, 皆为前所未有的。因此, 对这一农村社会变革加强研究, 深化认识, 乃是该时期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应当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

土地改革前, “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 占乡村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富农, 占有约 70—80% 的土地, 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 90% 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 却总

共只有约 20—30% 的土地, 终年劳动, 不得温饱”<sup>[1] (P84)</sup>。在土地改革中, 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被彻底打破, 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据统计, 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的农民当中, 90% 左右是贫雇农。例如, 冀中饶阳、河间、深县 764 个村土改中共抽出土地 162, 882.32 亩, 截止 1948 年 7 月, 在已分配的 153, 037.46 亩土地中, 贫雇农占了 86.31%。全冀中区贫雇农约得土地 80 至 100 万亩。除贫雇农外, 中农亦是土改的受益者。一部分少地的中农分得了土地, 其户数约占得地户的 10%, 占中农户数的 30%。如太行区中农所得土地占全部分配土地的 20% 左右<sup>[2] (P262)</sup>。地主、富农的土地则通过没收、抽调而大为减少, 降至人均水平, 甚至其下。

此外, 经过土地改革, 在土地占有的数量和质量上, 同一地区各阶层间亦趋于平衡。仍以上述冀中 3 县 764 个村的统计为例, 在土地数量上, 该地区土改后各阶层人均土地占有数分别为: 中农 3.48 亩、新富农 3.29 亩、贫农 3.10 亩、旧富农 2.96 亩、地主 2.54 亩; 在土地质量上, 仅据河间县 151 个村的统计, 人均标准亩为 3.1 亩, 土改后各阶层占有情况分别为: 富

收稿日期: 2003-04-28

作者简介: 秦立海(1972—), 男, 山东蒙阴人,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

裕中农 3.4 亩、中农 3.2 亩、贫农 3 亩、旧富农 2.6 亩、地主 2.1 亩。这种各阶层的土地占有量在当时是合理的、有代表性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农占有土地可超出平均量的原则。

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确立主要是以其土地占有量及其如何经营为基础的。因此,农村土地占有量的变化必然相应带来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据对山西黎城、平顺等县 5 村 964 户的调查,1939 年时,中农仅占全体农户的 32.3%,到 1947 年则已增至 84%。新增中农大多是由贫雇农上升的。全太行区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已占到农户总数的 40.25%<sup>[2] (P263)</sup>。另据 1949 年冬在冀察两省 23 村的调查,土改后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亦很显著。贫雇农由过去占总户数的 44%,下降到 15%(包括地主、富农下降在内),中农则由 37.6% 增加到 77%<sup>[3] (P812-813)</sup>。各地农村中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外,还尚存 10—30% 的贫农和 2% 左右的富农,但其贫困或富裕皆是由某些特殊原因造成的,已与封建剥削无关,因为地主阶级已被消灭。由此可见,土改后农村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呈现出由过去的“两极分化”转为现在的“两头向中间走”的发展趋势:地主消灭,富农剧减,贫雇农大量下降,中农急剧膨胀。这种变化使中农成为了农村人口的主体,一般由土改前占农村人口的 20—30% 上升到了土改后的 70—80%。这表明解放区农村封建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已成为历史,代之以基本均衡的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及其相互间的平等关系。

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变为现实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纷纷复垦开荒,兴修水利,改良技术,提高产量,解放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例如,太行区的神头村农民在土改结束后,喊出了“地权确定了,咱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好好生产吧”的心声。全村四五天内即买进毛驴、骡、牛 12 头。大家都说:“今冬我们要运输、贩柿;到明年,犁地下种不发愁。”<sup>[4] (1948-12-06)</sup> 这些言行充分体现了当时广大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和前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土改后,东北区农民复垦开荒,成绩显著。据统计,“三年来共恢复扩大耕地面积是 2,136,818 垧,其中 1947 年 800,000 垧,1948 年 779,818 垧,1949 年计划 557,000 垧”,“水田在 1949 年可恢复到 30 万垧,三年来增加将近 20 万垧”。在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东北区农民精耕细作,多上粪,勤锄草,改良品种,防治虫害,粮食产量平均每垧也由 1947 年的 1500 斤增至 1948 年的 1920 斤,增产

近 1/3<sup>[5] (1949-08-19)</sup>。

各解放区农民在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多方增加收入,效果明显。例如,太行区农民“生产渡荒农副结合,各地副业生产得利大,47 个村赚洋 5000 多万元”<sup>[4] (1948-06-25)</sup>。“平顺各村千余劳力打短工,半月赚麦米 500 石,冀钞 2000 万”<sup>[4] (1948-07-26)</sup>。“陵川牛家川春耕完成后,41 个全劳力,全体出动做担挑小贩生产,10 天生产赚洋 113.47 万元,能买小米 37 石多”<sup>[4] (1948-06-25)</sup>。

各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副业收入的增加,使农民的经济状况明显改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对吉林省蛟河县的保安、二龙、拉法三村(分别为工作先进的、中间的、较差的典型村)510 户的调查,土改后生活水平上升者占 55.9%,保持原有水平者占 34.3%,下降者(地主、富农)仅占 9.8%,具有中农生活水平者占总户数的 60% 强,比土改前增加 3 倍以上<sup>[5] (1949-09-14)</sup>。合江省汤原县兴安村“前年(1946 年)冬天还有的农民未穿上棉衣,去年(1947 年)冬天就不同了,全村农民都穿上了新的或半新的棉衣,其中换面不换里的占 60%,换里不换面的约 10%,有的全换了新的”,“贫农王俊和家 9 口人,过去从未换过新衣,顶多添置点旧衣料,今年(1948 年)买了 65 尺布,加上倒套子赚的 12 尺布,全家大小都换上了新衣面;中农裴德富家,今年添置了 3 床新被,8 件新棉衣”。土改后,该村大部分贫雇农在生活、生产资料方面得到了相当改善,已可赶上中农水平<sup>[5] (1949-02-14)</sup>。此外,各解放区农村的购买力亦不断提高,这一点在东北区及大城市郊区表现尤为明显。如辽东清原四道城场的农民,以 1948 年的购买力为 100 计算,1949 年提高到了 175.2,1950 年进一步提高到了 207.4<sup>[6] (P11)</sup>。总之,在土改后的各解放区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普遍的,亦是显著的。

土改后,亿万农民翻身不忘本,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处处拥军优属。当时,各地父母送子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光荣事例层出不穷,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援由此成为了解放战争的无穷力量源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sup>[7] (P21)</sup>

## 二

肃清地主阶级对乡、村政权的控制和影响,成立

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是解放区农村政权建设的首要任务。早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已组织起贫农团、农会,领导农村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对此,毛泽东曾强调:“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sup>[8] (P1250)</sup>经过土改,农民觉悟大为提高,他们不仅要求获得经济成果,而且要求获得政治成果,特别是在实践斗争中,更是逐渐认识到了掌权的重要性,树立起了当家作主的政权观念。这为新民主主义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由于土地改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除少数开明绅士外,整个地主阶级已成为专政的对象,因而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贫农团和农会基础上的人民代表会议制的人民民主政权便在解放区农村应运而生。

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逐渐探索建立起来的。“在1947年冬的土地改革中,各地已有许多县、区、村建立了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成绩和经验,如晋绥之崞县和华北之平山。这些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之代表,大多数是由各村群众大会直接选派出来,大村每村一人,小村数村合选一人,可以随时撤换。这种代表确实具有充分的群众性,会议也开的很活泼,讨论和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土地改革中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sup>[9] (P450)</sup>。正是基于这种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在土改中所发挥的良好作用,才在土改后继续保持下来,并加以改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

实践证明,人民代表会议是当时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所选出的各级政府委员会为各级政府权力机关,统一行政、立法、司法一切权力,各级政府须完全执行代表会议的决定,并须经常地、定期地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请求审查和批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所选出的各级政府委员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一切重要问题决定于代表会议,由政府委员会负责执行”,“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

式便于群众去直接掌握与监督政权,反对官僚主义。代表或政府委员有不称职者,可以罢免另选”<sup>[1] (P448)</sup>。具体到基层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体现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乡、村政府,乡、村政府执行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并受其监督。这样,广大农民不仅直接掌握了而且时刻监督着政权,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夙愿。当然,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在普选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尚不具备的特殊情况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最终必将发展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

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使农民成为了各解放区农村政治生活的主人,从而激起了广大农民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例如,在1949年春黑龙江省的村级普选中,广大农民踊跃参加选举,行使政治权利。据统计,当时全省80%左右的农民参选并大量当选。以通北石泉区为例,在全区选出的397名人民代表中,贫雇农占86%,中农与自由职业者占14%。在142名政府委员中,贫雇农占84%,中农及其他人士占16%<sup>[5] (1949-04-06)</sup>。这样,农村基层政权便牢牢掌握在贫雇农手中,广大农民从此真正在政治上当家作了主人。在此过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广大农村妇女也意识到掌权重要,踊跃参加村选,并有不少当选。据合江省桦川蒙古力区6个试点村的统计,在参加村选的3516人中,有妇女1653人,占47%。妇女当选为人民代表者28名,当选为政府委员者6名。其中双合和太平山两村的人民代表会副主席皆是妇女<sup>[5] (1949-01-23)</sup>。总之,农民的踊跃参选和大量当选,在当时不但建立和巩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崭新的农村政权形式,而且还在建政中加强了贫雇农与中农的团结,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这是解放区农村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

此外,在土地改革中,各地农村还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贫雇农积极分子,他们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认识和信任了共产党,大批加入了党组织。例如,在东北解放区,仅松江(哈尔滨除外)、辽北等省46个县到1948年夏即发展党员8600余人,其中90%是贫雇农出身<sup>[2] (P268)</sup>。大批贫雇农的入党不但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而且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巩固,解放区的农村政治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得各解放区农村政权建设进展顺利,成果显著。华北、晋绥两区的多数农村早在土改中就均已建立了代表会。其中,华北区的平山、曲阳、阜平和晋绥区的崞

县、代县、临县等县则已建立起了县、区、村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制的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东北区的吉林、松江、合江、嫩江、黑龙江 5 省在 1949 年春耕前也已基本完成了村级政权的选举,建立了村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属于农民,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是解放区农村政权建设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土改完成,村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后,农村工作主要是通过政权实现。区、村农会的工作,亦大都转移到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农会组织可否取消?对此,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土改完成,村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后,农会的作用自然减少,农会优秀干部应到政府及合作社去工作,但也不应马上取消农会,而且今后工作中需要通过农会者仍应通过农会;特别在民主建政人民代表会选举中,对一般的守法地主、旧富农分子,原则上应恢复其公民权,农会更有其重要作用,且人民代表会议政权一时还不能组织好或不巩固,乡村中的各种工作和经常制度尚未确实建立起来,故农会暂时还不应取消”<sup>[1] (P440)</sup>,而应成为乡村政权的得力助手和社会基础。实践证明,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制政权建立后,农会组织的继续存在,对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阶级关系方面的问题,促进人民代表会议制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

土地改革前,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残酷剥削,政治上受到严重压迫,而且在文化上亦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致使大多数农民目不识丁,成为“睁眼瞎”。此外,广大农民特别是妇女还受到封建礼教甚至是封建迷信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思想观念落后,陈规陋俗繁多。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民个人身心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土地改革对此产生了猛烈冲击,使解放区农村社会呈现出了一派新气象。其中,文教事业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表现尤为明显。

经过土改,农民成为了农村政治经济生活的主人。发展生产,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需要,激起了广大农民学文化的高度热情。解放区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大发展的新局面。

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的需要,各解放区积极恢复和发展中小学教育,为广大劳动人民子女提供就学机会,成绩显著。例如,东北区自 1946 年至 1948 年,小学发展到 37,000 所,入学儿童达 300 余万人

(其中农村小学 33,600 余所,教员 43,000 名,小学生 248 万余人),较伪满最多时期的 220 万人增加约 1/3<sup>[5] (1949-04-04)</sup>。入学儿童的家庭成分亦有很大变化,大批贫雇农和城市劳动者的子女得到了就学的机会。据统计,在小学里,工农子弟占学生总数的 88% 以上;在老区的中学里,贫雇中农子弟占 51.8%,工人干部子弟占 6.9%<sup>[5] (1949-05-25)</sup>。吉林省蛟河县 1948 年全县共有小学 194 处(其中民办者占 179 处),教员 335 人,学生 13,166 人,已占全县学龄儿童之半,同 1947 年相比,学校增加 95 处,即 96%;教员增加 216 人,即 181%;学生增加 7,210 人,即 121%<sup>[5] (1949-02-17)</sup>。太行区树掌村上高小的学生,女的比男的多。小学生中女生占 1/2<sup>[4] (1949-03-08)</sup>。这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各解放区社会教育发展迅速,成绩亦相当突出。各乡、村纷纷建立起冬学、夜学、文化站等,组织农民识字,学习政策、法令、时事,开展文娱活动。例如,东北区 1948 年建立冬学 30,762 处,学生达 1,232,299 名<sup>[5] (1949-05-25)</sup>。其中,吉林省蛟河县“秋收将近结束时,县委即着手准备开展冬学,并在全县 130 人的教师训练班中,交付了帮助组织冬学的任务。至 12 月初,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冬学运动。据新治、乌林等十个区统计,345 个屯中有 254 个屯成立起冬学。参加学习者达 1100 余人,占人口 11% 强”<sup>[5] (1949-02-17)</sup>。华北老区自抗战以来,年年开办冬学。土改后,冬学规模之大,农民学习热情之高更是空前。仅据晋察冀及北平市郊农村统计,1949 年冬参加冬学的农民即达 360 余万人。山西一省即建立冬学 2 万余所,平均每个行政村 2 所。农村中青年的学习热情尤其高,据山西黎城、平顺等县 218 个村的统计,14 岁至 25 岁的青年入冬学者占 90% 以上。经过冬学学习,一般皆能识 200 字,成绩好者达 600 多字,能写日用便条和简单信件<sup>[2] (P269)</sup>。太行区的桃阳村 60 多个青年妇女,自 1944 年组织起识字班,到 1949 年不但一直未垮,而且已发展成补习学校,学习国语、珠算和地理等。文化水平相当高,有五个妇女已能读报<sup>[4] (1949-03-08)</sup>。吉林省蛟河县于 1948 年 8 月间,成立民众教育馆,比较有系统地开展了文娱活动。其中组织的业余剧团,演出了《血泪仇》、《一切为了前线》等 5 个剧,深受群众欢迎,极富教育意义<sup>[5] (1949-02-17)</sup>。合江省勃利县中兴、杏树二区各村成立读报组,及时宣传形势政策,农民听报情绪很高<sup>[5] (1949-02-14)</sup>。晋绥区临县 30 个村镇创办了黑板报,进行宣传教育,成效显著<sup>[10] (1948-12-10)</sup>。这些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在各解放区农村开展后,深受农民欢迎,不仅使广大农民从中学得了文化知识,提高了自身素质,而且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进步。

妇女的解放及其地位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解放区农村虽经抗日战争的洗礼,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买卖婚姻”等封建枷锁和陈规陋俗仍严重束缚着广大妇女。土地改革强烈冲击了这些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社会氛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过土改,妇女同男人一样分得了法定的一份土地,在家庭拥有的土地财产中,亦有她们的一定份额,再加上参加生产劳动,妇女便有了经济地位,这是妇女解放的物质基础。正如当时报纸所讲:“过去是:母猪不敬神,‘娘们不算人’,好男人到县,好女人到院。而现在则完全变了,妇女已上了桌面。人人有了一份财产,共同劳动,共同处理。”<sup>[4] (1949-03-08)</sup>由此可见,土地改革从根本上为妇女力争在家庭中成为平等的一员,在社会上与男人平起平坐创造了条件。

农村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亦开始逐渐改变。一些做父母的已认识到婚姻是子女自己的事,不应乱加干涉。广大青年妇女更是要求实现“婚姻自由”,主张自己找婆家,并付诸行动,旧的婚姻习俗受到强烈冲击。青年妇女选择对象,主要是以家庭成分好坏与本人进步不进步为标准,一般找劳动青年。例如,太行区北流村一位女党员,因未婚夫思想落后,便解除婚约,同程家山村政治主任结了婚,成为一对革命夫妇<sup>[4] (1949-03-08)</sup>。晋绥区临县五区楼子沟一个村,即有3个青年妇女自己找到对象,不要彩礼结了婚。岢岚李家坪村妇女纷纷控诉买卖婚姻罪恶,召开村妇女大会做出决议:“一、今后咱们儿女的婚姻,要由儿女自主,父母不得干涉和出卖女儿。二、反对早婚,实行男20岁,女18岁以上方可结婚的规定。”<sup>[10] (1949-02-27)</sup>这类事实表明,解放区广大农村妇女已认识到买卖婚姻的不合理性,开始自动起来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

此外,土地改革对长期束缚妇女的封建传统习俗也带来了冲击,一些陈规陋俗开始逐渐消除。例如,太行区妇女结婚时坐花轿和拜天地已不合时宜,

开始举行婚礼。另外,寡妇再嫁要从婆家哭着走,闺女不能在娘家生孩子,也不能同女婿一起住,轻视不生育的妇女等封建思想也有所改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在处理家政家务上取得了发言权,有的已经当家作主。例如,太行区的树掌村388户家庭中,青年妇女当家的就有136户<sup>[4] (1949-03-08)</sup>。这些变化表明,广大妇女在追求自身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当然,不可否认,土改后解放区农村在妇女地位、思想观念等方面所出现的新变化,从总体上讲还不是普遍的、大量的现象,而是尚属初显端倪,但它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代表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

综合全文所述,不难看出,解放区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主的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变革,同时也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当时,这场社会变革对解放区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无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巨大变化,已远远超出了土地改革本身所要实现的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范畴。这实际上不但等于宣告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在解放区农村的彻底终结,而且还使广大农民第一次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真正成为了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Z].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 [2] 董志凯.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3] 史敬棠. 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史料: 上册[Z]. 北京: 三联书店, 1962.
- [4] 新华日报: 太行版.
- [5] 东北日报.
- [6] 农业部计划司. 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 1952.
- [7] 毛泽东选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8]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4卷[Z].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 [10] 晋绥日报.

责任编辑: 李为香

Ben” culture and democratic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building.

### **A Study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Countryside Caused by the Land Reform of Liberated Area**

QIN Li—hai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land reform of liberated area was not only a chang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field,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social change. It produced a great impact and unprecedented change on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the liberated area countryside at that time. It opened an entirely new atmosphere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 **The Image Word System of Ancient Poetry**

DENG Che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Beijing 100866, China)

It is because that “Xing” is different from “Bi” (metaphor) and because of the being of “Xing” that image is independent and plentiful. These images had been existent from “Shijing”, because of which ancient poetry has unique image words system these images.

### **The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the Choice of Honest Conducts between Enterprises**

WU Xue—hu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02, China)

Enterprises will deceit each other if there is no supervision, otherwise, they will be honest to each other if there is completely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depends on the game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tend to deceit in trade if the expect profit rate, the strength of supervision and penalty are low. In conclusion, Supervis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long with the drop of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increase of trade quantity. Reinforcing the strength of penalty is a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honest economy.

###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ANG Zhong—w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he meaning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 is that man's idea, action and civilization is constantly enterprising, and has advanced situation according with the time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 consists of material, spiritual and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s and man's quality development, etc, all of which have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李为香译校)